

# 明代以降云贵川地区方志药用物产知识的历史书写

左 亮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 社会工作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明代以降云贵川地区方志有千余种,其中所载药用物产条目蔚为大观,达4万余条,近110万字,形成了层累的方志药用物产知识。借由历史书写这一研究范式,将方志药用物产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解读。通过志书纂修者的个人意识、国家视野下的文化整合与中西交流下革故鼎新回溯方志药用物产书写历程,再现其书写场景以及在文化与文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云贵川;地方志;药用物产;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5-0056-10

## A Historical Writing of Medicinal Products in the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Reg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Present

ZUO Lia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School of Social Work,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here are over 1,000 local chronicles of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s since the Ming Dynasty, of which the number of entries on medicinal products reaches over 40,000, totaling nearly 1.1 million words, forming a cumulative local chronicles knowledge of medicin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entries on medicinal products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interpret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knowledge of medicinal products in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s. By trac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local chronicles entries on medicinal products through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of compilers,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state's perspective, and the innovation and renewal under the exchange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the writing scenarios and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are reconstructed.

**Key words:** Yunnan, Guizhou, Sichuan; local chronicles; medicinal products; historical writing

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是指,记载于云贵川方志当中,在当地特定的历史、文化及地域背景下,用于人体养生和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具有药用价值并尚未进行炮制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等天然物品。其主要记载于物产篇目当中,大多数专列于“药属”分类之下,但也有部分散见于其他篇目或者物产篇目的

**【收稿日期】** 2023-10-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智技术驱动下方志物产多模态资源知识重组与叙事服务研究”(23BTQ059); 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站中)“地方志物产的文化记忆建构、认同生成与数智传播”(2023T16032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农业与健康交叉创新研究”(KYCXJC2024001)

**【作者简介】** 左 亮(1989- ),男,博士,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信息组织、思想政治教育。

其他种属中。与传统本草典籍不同,方志所记载的药用物产往往受到内倾型熟人社会特征的影响<sup>①</sup>,书写时往往持有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特征,极少记载他处药物。另外,传统本草典籍对药物进行描写时,其内容全面而专业<sup>②</sup>。其专业性造成了本草医药著作中的医药知识在传承时往往依靠言传口授、学派内单线传承。在传播时其受众往往面对的是学者、传教士以及专业医士等精英人群,普通大众一般难以接触和学习。而方志成书以后直接面对的就是当地民众,通过对方志所载药用物产的传而诵之,指导当地民众多学多识,并非“以供文人之笔,客子之登眺”<sup>③</sup>,发挥的是“敷教所以行道也,敷文所以明道也”<sup>④</sup>的功能。因此为了加强当地民众对于药用物产的认识和利用,药用物产知识的书写较为简洁,生活指导性强,普及程度较高<sup>⑤</sup>。

云贵川药用物产知识在书写时,为更好地指导实践,其记载内容往往十分直观,主要涉及该药用物产的别名、地名、人名、引书、性状、命名理据、药用部位、功效、炮制方法等。其中别名与药用物产正名是相对而言的,涵盖了当地对其独特的称谓,如无名异在贵州被称为土子。地名则是反映出药用物产的出产地点。人名则是为了突出该药用物产的典故、故事或者记载出处。引书或是释名、或是解释药用的别名、或是命名原因等。性状更多强调的是该药用物产的生物学特性,如“冬虫夏草,形如萝卜而细小。”命名理据反映的是基于当地对药用物产的观察和理解,让药用物产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sup>⑥</sup>。药用部位是药用物产用来治疗不同病证的部分,如花、叶及果实等。功效是药物对人体的医疗作用在中医学范畴内的特殊表达形式,包含了当地对于药用物产功效的普遍认识和地方性认知。炮制方法是当地对于药用物产独特的使用经验。

目前学界有关方志药用物产的研究成果颇丰<sup>⑦</sup>,诚然学者们利用方志药用物产文本进行了深入挖掘,然而方志药用物产文本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云贵川地区连续不辍的修志传统,加之书写内容根据时代需要不断修正、叠加,形成了千余种层累的志书资料,其间药用物产的记载条目达4万余条。随着云贵川药用物产数据数量和维度的增多,药用物产知识的高度语境特异性让我们有条件关注审美、情感、意义等层面的问题,发挥人文经典通约性和稳定性的共情能力<sup>⑧</sup>。在社会文化史,尤其是后现代史学思

① 陈野:《关于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内在关系的探析》,《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8期。

② 以《本草纲目》为例,其中的每味药材都会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并且有“有释名、集解,以考名称、形状、气味、主治,以别寒热、功用;发明以着其效;正误以定其讹;修治以和其性。且主治未备,则有附方,物质相同,则有附录。亦可谓详尽矣。”参见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凡例,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

③ 崇祇《吴县志》序,明崇祇十五年(1642)忘本。

④ 民国《抗县志稿》卷1,《前志序跋》民国三十七年(1948)抄校本。

⑤ 叶友琛:《传统教化:明万历〈归化县志〉的样本解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⑥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1页。

⑦ 目前围绕方志药用物产的研究,多是将方志药用物产的文本作为史学研究的资料集中于文献层面的考量。其一,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将方志作为考证药物原始产地及品种等的原始资料,阐释方志对于本草考证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参见程志立:《地方志对药学的贡献》,《广西中医药》1985年第3期;万芳、钟赣生:《方志与药学史研究之刍议》,《中国药学杂志》1998年第3期;韩素杰、Shelly Chen:《基于地方志的江苏省土产药物研究》,《中医文献杂志》2018年第4期;吴孟华、马志国、张英等:《两面针的本草考证》,《中国中药杂志》2021年第20期。其二,从历史地理学切入,考察药用物产的地理分布,以及地理环境对道地药材产区的影响。相关研究参见丁芬芬:《东北地方志涉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吉林省为例》,长春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代玄烨:《清代中原地区药材空间分布与道地药材——以方志为中心的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梁飞:《明清时期部分地区道地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其三,从文化学视野出发,剖析药用物产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属性,构建助推中华文化的方志医药文化时代模型。相关研究参见罗浩:《明代北京地方志中医药文化发掘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孙灵芝:《古代地方志里中医药文化资源研究》,《中国医药导报》2019年第13期。

⑧ 刘石、李飞跃:《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潮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以“历史书写”这一研究范式尝试修正传统史学通过“文本”重建“过去”的实证主义立场,将地方志当作一种“被建构的文本”,尝试通过对其产生过程的解构,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观、政治社会环境、文化思潮以及作者个人意识对书写的影响,以期“回向更早的过去”,探究更加真实的“历史事实”<sup>①</sup>。历史书写研究范式的一种常见方法是“以某类史籍”作为考察对象,“不拘泥于具体内容,从整体上比较不同时期同一类别的一组文献的性质、结构等,由此探讨文献形成背后的政治或者文化氛围。”<sup>②</sup>具体到地方志研究,不同时期、同一类型、不同版本的云贵川地区方志药用物产就可以视作“同一类别的一组文献”。因此通过“历史书写”这一研究范式,以方志药用物产文本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以文本蕴含的知识发展过程作为研究线索,以药用物产知识书写的影响因素作为内在动力,讨论方志药用物产知识的书写历史。从中窥见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知识的书写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发生了何种变迁,是本文所需探讨的问题。

### 一、公私兼济:纂修者群体的个人意识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自身对过程的理解形成的包括经验和理论在内的总和<sup>③</sup>。从方志药用物产知识语境出发,其包含了纂修者独特的偏好、价值观念和思想观点等个人意识,是个人对特定区域内药用物产知识不同的认知态度、使用经验和情感体验<sup>④</sup>。纂修者群体的个人意识对方志药用物产的书写影响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知识书写时,志书纂修者们或是在编纂志书之初,就将“优越特性”作为一项标准纳入志书纂修体例当中。云贵川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多见垂直气候带,“小气候区”众多,得天独厚的地形与气候环境,形成了云贵川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云贵川地区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孕育了许多优质的药用物产。这些优质的药用物产,被记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志当中。

在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书写时,为了突出本地所产的优质药用物产,常会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标识。首先,在“物产”卷目纂修过程中,纂修者们会制定物产收录标准,注重收录本地专产、特产或优产药物。如民国十二年(1923)《眉山县志》载:“或名人称道,为眉著产,始行列入”<sup>⑤</sup>。甚至会在记载时专门列一类目,增加“名贵药物”<sup>⑥</sup>这一类别。其次,优质物产以土贡的形式进行记录。中国历来有着“任土作贡”的传统,如孔颖达所言“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sup>⑦</sup>,特定区域的特定药用物产就成为了土贡和税赋的来源<sup>⑧</sup>,并且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伪品、次品的现象不大会出现<sup>⑨</sup>。如清雍正十一年(1733)《四川通志》载:“木兰皮,蜀州土贡。”再次,在药材前加以产地名称,表明道地性。如云茯苓、云当归、滇重接、滇龙胆、黔党参、川贝母、川芎、川牛膝、川大黄等。最后,为了突出地方拥有名贵药用物产的自豪感,纂修者们会以本地的优产、特产以及名产作为重点记述内容纳入药用物产的记载中,并会注明“为佳”“为上”“最佳”“第一”“为最”“为良”“尤著”这样的描述信息,以此来彰显药用物产的品质。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永

① 周毅:《方志中的“历史书写”研究范式——一个方志研究的新取向》,《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

② 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

③ 谢伏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5月17日,第9版。

④ 韩志明:《从官僚知识到个人知识——国家治理转向的知识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6期。

⑤ 民国《眉山县志》凡例,民国十二年(1923)石印本。

⑥ 任映沧:《大小凉山开发概论》,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第52页。

⑦ 孔颖达等撰:《尚书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⑧ 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⑨ 严奇岩:《从唐代贡品药材看四川地道药材》,《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



川县志》载：“牛膝，味苦酸。治湿痹、脚气。其性引下。《本草》注云：‘茎有八节，形似牛膝，故名。’一名对节草，川产最胜。”<sup>①</sup>清雍正十一年（1733）《四川通志》载：“贝母，平番出。甘松无渣者佳，他处皆不及。”<sup>②</sup>

其二，药用物产不仅是与自然环境共嵌共存的产物，在云贵川药用物产知识历史书写时，还融入了与“民族社会”机理共融的医药知识。明清时期，中原王朝致力于将现在的云贵川地区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和管辖范围，以汉族移民迁徙为载体，沿古驿道打通和拓展了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通道”。开启了西南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具有“流动性”的新格局<sup>③</sup>。云贵川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分布着藏族、傣族、彝族、壮族、瑶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民族都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医药知识，共同汇聚成为我国伟大的医药宝库。民族医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是各民族运用其独特的生活与思维方式，通过认知生命、维护健康的集体智慧，维护着该民族群体的健康以及孕育和滋润着它生发的土壤。其实践的地域范围主要围绕民族聚集区范围展开，并在社会基层繁衍生息<sup>④</sup>。

在云贵川药用物产知识中，一是记载俚医、土人、土医等用药的具体实践。在云贵川药用物产记载中，出现了大量的俚医、土人、土医等称谓。俚医和土医多指民间医生，但是土人的概念较为复杂，是一种来自外来移民对本地土著民族的一种较为客观的认识和区别称谓，具有较强的多元化民族属性。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居土日久的地方土著；第二，具有鲜明社会特征的民族群体；第三，既不同于普通的土人，又不同于后期移入的汉人，而是有汉化倾向，却又未完全脱离土人的习俗和特征之人<sup>⑤</sup>。如明景泰六年（1455）《云南图经志书》载：“龙胆草……土人五月采之，以为酒药。”<sup>⑥</sup>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彰明县乡土志》载：“鹅郎草……煎膏戒鸦片烟瘾甚良，土人试之亦有效。”<sup>⑦</sup>民国八年（1919）《绵竹县志》载：“金刚藤，土人采其茎用火烘之，则绵软如意且坚韧异常，可以作帐钩，手镯，带之可防痧症，甚有效。”<sup>⑧</sup>二是记录了大量本草未载的民族医药经验。在明至民国的地方志中，云南共计有13种药用物产未被本草收录，分别为鸡脚参、酸渣子、细花参、背米、蓝花参、毛风藤、地石榴、铁线草、松明柴、斑庄、被单草、妙团。贵州共计有11种药用物产未被本草，分别为葶精子、无名异、四块瓦、随手香、一串铃、鹧菜、鹿衔草、霸王鞭、五爪龙、爬岩香、一朵云。四川共计有2种药用物产收录，分别为大母药、生扯笼等。这些未被本草收录的方志药用物产或许是地方民族用药的生动体现。

其三，志书纂修者在纂修志书时，或是将其作为励官箴的需要。志书纂修者大多是州县官员，而明清时期州县官的施政环境十分恶劣，受到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习惯以及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官场名为宦海，人即为舟，旦夕风波夫岂能料？”<sup>⑨</sup>那么如何保证自己在从政期间能够顺风顺水，至少是少犯错误，遂成为明清众多州县官员的重要诉求<sup>⑩</sup>，“勤”就成了地方官员励官箴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在方志药用物产书写时，“即慨然念州志残缺，实长吏之耻”<sup>⑪</sup>，秉承“士君子读书稽古，期于实用，苟一日得志，要惟上以致君，下以泽民，以无负乎素志而已”<sup>⑫</sup>的原则，一方面对旧志所载药用物产进行考辨，

① 光绪《永川县志》卷2《舆地志下·风俗》，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② 雍正《四川通志》卷38《物产》，清雍正十一年（1733）抄本。

③ 孙兆霞、金燕：《“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④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92-494页。

⑤ 张洪滨：《明清贵州“土人”问题考释》，《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⑥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楚雄府》，明景泰六年（1455）刻本。

⑦ 光绪《彰明县乡土志》不分卷《格志物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抄本。

⑧ 民国《绵竹县志》卷8《物产志》，民国八年（1919）刻本。

⑨ 《官箴书集成》第6册，《文静涵太守自历言》，黄山书社，1997年，第711页。

⑩ 曲长海：《饰吏贵儒术：明清时期的官箴与吏治》，《理论学刊》2020年第3期。

⑪ 康熙《新兴州志》序，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

⑫ 雍正《呈贡县志》跋，清雍正三年（1725）刻本。

并补充描述信息。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知识秉持“充贡赋者,微物必详。经见闻者,所知皆记。考古证今,删繁摘要,物增于前,文减于旧”<sup>①</sup>的原则,对药用物产不断增补删削、延续叠加,为当地的药用物产提供了跨时代的文本呈现。并且在药用物产记载的延续中,对于药用物产“举旧志所不收,或收而失实,或讹而相冒,或混而无别,或析而无当,悉厘正之。上下千余年,条列如指掌。”<sup>②</sup>如《会理州志》,清乾隆六十年(1795)在对药用物产进行记载时,只是通列物名,无任何相关性描述,而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新纂志书中,对当地药用物产别名、性状、产地、生长环境、主治、功效、药用部位、炮制方法、培植要点及药用之方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如:“泽兰,别名曰:水香、都梁香、虎兰、虎浦、龙枣、孩儿菊、风药。其根名地笋。叶似薄荷,芳香,亦能治血疾。”<sup>③</sup>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药用物产记载弊病和偏差,使得药用物产知识的记载不断趋于客观、准确,呈现出更加合理的高品质药用物产历史形态。

此外,志书纂修者们援引正史、本草典籍、地理著作等对所记药用物产进行考辨和说明,以此彰显自身所做的重要工作。这可能是出于志书纂修者们“身游天末,既多耳目所未经,迹寄海隅,尤属舟车之罕至。倘无述作,便觉吐嘈,历有见闻,何烦重译。爰以簿书之暇,广搜载籍之遗”<sup>④</sup>的思想觉悟和行动自觉。云贵川地区方志药用物产在书写时往往“录其于古有征,于今有用者,以俟方来。”<sup>⑤</sup>因此引书十分广泛。整体观之,引用本草类著作最多,共有24种,其中四川地区引《本草纲目》最多,达500余次。云南地区引《滇南本草》次多,达400余次。贵州地区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较多,均有100余次。字书引《说文解字》,经学引《诗经》《尔雅》,农书引《齐民要术》,谱录引《群芳谱》,志书引《太平寰宇记》《一统志》,这样的引用也较为普遍。此外也会引用一些宗教类典籍,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安岳县志》在描述“藿香”时,对其别名就引用了佛教经典《楞严经》和《金光明经》中的记载:“《唐史》顿逊国出藿香,《楞严经》谓之:兜娄婆香,《金光明经》谓之:钵怛罗香,《图经》脾胃吐逆为要药。”<sup>⑥</sup>概而言之,方志药用物产的引书浩繁。涉及正史、医书、志书、地理、诗文、笔记、农书、谱录、经学、小学等各类历史文献典籍,或是正名命物,初建地方生物分类体系;或是以地理山川为纲广记方物,对居处的动物、植物以及矿物的名称、性状、地点、功效等进行较为形象的描述;或是开启亲身参验、“博而且信”的新风,使古代博物知识得以承袭扩散、层叠累积;或是从关注万物秩序转向内在性理探讨,格物致知;或是对当地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及地域背景下的药用物产资源进行的系统汇总。方志药用物产所体现的医药知识不是单独的、个别的、碎片化的知识,而是旁征博引,参考大量典籍资料,对药用物产内容作以补充说明,形成了宏观的全面性、系统性的知识整体。

方志系当代人著当代史,方志药用物产的书写者们既是地方志纂修的主体,也是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传承者,他们“不畏难不避嫌而汲汲图之”<sup>⑦</sup>,具有高度重视以及传承地方医药知识的文化自觉。其对药用物产的看法不同于历代本草学家,带有更为明显的个人意识。与传统本草典籍所关注的宏大叙事不同,地方志纂修者们更加强调细节与独立视角,秉持着对地方优质药用物产的自豪感、对民族医药的认同感以及体现“守土之责”的责任感,将地域药用物产在方志中充分体现出来,为后人呈现出地域性的医药类型以及鲜明的医药文化特质,与本草学家的观点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对应和参照关系。

## 二、渐染华夏:国家视野下的文化整合

明代以降药用物产之所以频繁地出现在方志记载当中,这可能是由于这些知识作为古代社会窗口,

① 安大伟:《知识书写与社会变迁: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② 崇祯《吴县志》序,明崇祯十五年(1642)刻本。

③ 同治《会理州志》卷10《风土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④ 康熙《姚州志》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

⑤ 民国《巴县志》卷19《物产上》,民国二十八年(1939)刻本。

⑥ 道光《安岳县志》卷15《土产》,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⑦ 嘉靖《仁和县志》序,清光绪十九年(1893)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

反映出“汉族精英阶层的文化关注点与文化假设”,也“阐明了秩序缔造者急于向读者展示的有序世界”<sup>①</sup>。明清两代始终坚持儒家的大一统观念以及华夏大民族主义,将文化作为加强中央与地方交流的手段。而文化作为各民族之间交流互动的基础,既要求又产生了地方与中央语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sup>②</sup>。在此种语境下,不仅意味着云贵川地区志书纂修者在药用物产书写时采用了与华夏民族同一的标准,而且也体现了在这种文化差异迁延中地方与中央药用物产知识体系互动性的书写过程。

其一,明代“改土归流”制度的实施,加强了云贵川边地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促进了云贵川边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委派的流官们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吏”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师”的教化功能。志书纂修者们充分认识到,移风易俗仅仅靠政治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实现。因此在明代全国政治空前统一的前提下,志书纂修者们坚持“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文教政策并且秉持“先富后教”的儒家教义,开始自觉地引入中原儒家思想,将志书作为一种教化的手段。自觉实践儒家的文化理想,将儒家大传统逐渐渗透到云贵川地区的民间生活之中<sup>③</sup>。并在记录地方性知识时,依例行事,并采用汉文字这一典型的文化符号和准确表达意义的工具作为知识书写的媒介<sup>④</sup>。此背景下中原医药知识开始不断向云贵川地区传播。早期云贵川地区人们在面对疾病时,“尚祷祈,或延喇嘛而诵梵经,或入寺院而拜佛像”,寄健康于神灵,或是“画符以避邪祟”,或是“问卜以测死生”。虽然在当地有传统医家存在,但是对于药物知识的匮乏,看病时往往“不察明堂,不究息脉,但以病者之溺一盃,用木枝挠之,观其颜色、泡影而已。”对于药用物产的使用“不外草、木、鹿茸、麝香之类”,缺乏药物及病理认知。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凡改流之处皆有医士,以疗民病”<sup>⑤</sup>。官员和医士所带去的药用物产知识与实践经验深刻地影响着当地药用物产的认识和使用。

其二,“官僚式”知识组织模式的助推。传统本草医药著作的纂修者多为医士或者药学大家,这些医药著作是作者所及范围内的全域性药材普查,其所载内容丰富,但对药物产地记载较为简略,具体地域指向不详<sup>⑥</sup>。如《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黄芪,“生蜀郡山谷、白水、汉中”<sup>⑦</sup>,只是列出了出自蜀郡、白水和汉中,并没有指明具体的产地。但是方志药用物产知识则不同,如前文所言,在方志中地域性这一内涵体现得十分明显。这或许出于明清两代中央王朝不断强化国家权力与地方的互动,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督促甚紧,要求基层单位“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明永乐十年(1412)与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分别颁降《修志凡例》《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规范。《修志凡例》共有17条类目,第五条为“土产、贡赋”,《纂修志书凡例》共有21条类目,第七条为“土产”<sup>⑧</sup>,其中的土产篇目就是要求记载一地的物产。地方官员或迫于功令、或受制于权力的支配,开始“旁搜幽讨,溯流寻源,或稽证于他编,或索遗于重译”<sup>⑨</sup>,由此向上级政府“扬其政绩,以斯人能效力于国家,则父母之邦有荣焉”<sup>⑩</sup>。

① [美]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②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页。

③ 廖荣谦:《循吏与教化:明代流官与贵州儒学建构——以方志为考察对象》,《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④ 周英惠:《地名传播:方志典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基于〈钦定西域同文志〉的文献考察》,《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

⑤ 民国《西康建省记》,不分卷《西康医药记》民国元年(1912)铅印本。

⑥ 白宇明、郝近大:《方志对本草考证的重要性》,《中医学报》2019年第8期。

⑦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2《草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张鼎思刻本。

⑧ 《修志凡例》和《纂修志书凡例》的颁布为推动志书编纂体例的程式化和标准化提供了方向,后续志书在编纂时多沿袭遵循此例。参见刘永强:《明代方志编纂的“书法”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⑨ 嘉靖《普安州志》序,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

⑩ 万历《嘉定县志》凡例,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



聚焦到地方进行方志编纂时,纂修者们为了更加突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和知识,强调属地特征,在各地方志编纂之初,凡例制定之时,就会在《大明一统志》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将特色这一要素作为纂修标准予以执行。如在《滇云纪略》纂修凡例中明确指出:“滇中物产众多,中有奇特,为他省所绝无者,亦附录焉……以资见闻。”<sup>①</sup>在方志药用物产知识具体书写过程中,更是将一地药产作为筑基之本,秉承“考镜得失,奉宣德意,以义安一方”的原则体现“守土者之责”<sup>②</sup>。故此地方志在纂修时,以固定地域作为记述范围,越境不书、通典不录,以“一方水土”为记述重点,强调地方特色,凸显“一地之情”。其“据地以书”,或是以县乡为单位,或是以省府为单位,药用物产产地多注明县域、乡村甚至是山水名称。其越境不书,只记载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药用物产的特点,使得药用物产产地具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如清道光二十二年(1892)《龙安府志》载:“黄芪,产石泉。”<sup>③</sup>由此可知,黄芪的产地为龙安府石泉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正是由于古代中国的官僚式知识组织模式,才使得中原文化传统得以在地方得到稳定性和一贯性的传播。

其三,中原文化也在不断影响着云贵川地区药用物产的书写。随着乾嘉时代考据大兴,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学者们发凡起例,构建的志书理论颇受士林的关注和认可,提升了志书编纂的学术品位。在中原士林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志书编纂也受到这种学术风气的浸染,开始注重史料考订,在编纂志书时,按照“志载方物,非谱群芳,凡从同常见,无关考索者,固可无庸备数也”<sup>④</sup>的朴学要求对物产进行书写,讲究言必有据,据实据事直书。如贵州大儒郑珍、莫友芝在编纂《遵义府志》时,对草乌等35味药用物产的书写依据《陈志》,对牛膝等9味药用物产的书写依据《绥阳志》,对五加皮的书写则是依据《蜀语》,无一不体现了朴学“擅长考据,一物一事,务求精确,实事求是”的特点。除此之外,往往以“按语”形式来增补药用物产知识,“旧志所当摹传,间有疏漏则增补之。讹舛则订正之,皆称‘按’以识其别”<sup>⑤</sup>,在清光绪二年(1876)《资州直隶州志》中就体现了以“按”形式来补入新知,如“续随子,《唐书地理志》陵州贡续随。《寰宇记》续随子一名百两金,五月五日采陵州,旧常进。(按)续随,今名千金子,苗如大戟,秋种、冬长、春秀、夏实。”<sup>⑥</sup>同时一些“小学”大家也会在编纂志书时融入考据学特征,如俞渭、陈渝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编纂刊成的《黎平府志》中,将药材分类为“释药”,记载药用物产如“川练子即仁枣,一名苦练子。味苦,性寒,能治伤寒瘟疫等症。根大苦,一切游风、热毒、恶疮、疥癣,俱可治。《药谱》名:‘仁枣’。”<sup>⑦</sup>由此可见,云贵川地区方志物产书写中所贯彻秉持的考据方法,或许正是中原学风渐染边疆地区药用物产书写的写照。

在明代以降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的历史书写中,可以看到“在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的生产、保存和传播总是和强权联系在一起,依靠的是官吏和毛笔而非武士与刀剑。”<sup>⑧</sup>在王朝大一统的趋势下,云贵川地区药用物产文本书写的多元转向和医药知识文化的科学整合过程,正是云贵川地区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变迁下的重要一环。在中央与边疆之间的医药知识交流互补的过程中,可以窥见“王化”所及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地方对于中央王朝和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作为一种有形可感的地方医药知识历史记忆,还原了中央与地方医药知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大传统学术资源与地方文化经验结合后的特殊医药文化风貌。

① 嘉庆《滇云纪略》凡例,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

② 嘉庆《宁国府志》卷32《杂志》,民国八年(1919)影印本。

③ 道光《龙安府志》卷三《食货志》,清道光二十二年(1892)刻本。

④ 道光《遵义府志》卷17《物产》,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⑤ 嘉靖《尉氏县志》凡例,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

⑥ 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8《食货志》,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⑦ 光绪《黎平府志》卷3《食货志下》,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⑧ [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6-197页。

### 三、经世致用：中西交流下的革故鼎新

清末,外有西学东渐,内有洋务维新。一方面西方的文化科技知识开始陆续传入中国。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少数志书纂修者渐渐有了近代科学眼光与科学知识,尝试利用自然科学方法指导修志实践。以期“合乎近代精神,运科学之方法以求古今变迁演进之文化。”<sup>①</sup>中国方志传统书写出现的文化调适新征兆开始有所显露,预示着方志药用物产文本无论是体例或是内容都在酝酿着新的转型与变化。志书纂修者开始对药用物产的记载不断更正,尝试使用西方的分类体系以及知识表达,近代科学知识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志书纂修者怀抱桑梓热情,考虑的不仅是如何继续书写地方药用物产知识,而是更多关注其实践层面,即如何利用药用物产发展实业,以实现经济富强。

其一,方志药用物产的分类体系从传统的单一分类体系向传统和近代复合分类体系更新。从云贵川地区的药用物产记载来看,明代到清代末期,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的分类体系主要以传统单一分类体现。药用物产虽然可以以植物、动物及矿物三类进行区分,但是在三类之下又会存在“然细别之,不惟三者,各殊其类,即一类中亦各名目纷繁,即条分缕析仍然挂一而漏万”<sup>②</sup>的问题,再加上早期的志书纂修者涉及“草属”“花属”“药属”中等具体物产时,并不能系统、精确地进行种属区分。因此大部分志书在自然属性分类法的基础上,药用物产以药属、药类、药品等类目进行单列。诚然大多数药用物产会被划入“药属”,但是也会存在某种物产在甲志中划为“药属”之类,在乙志中又会被划为“草属”或“花属”之类这样的现象。未被划入“药属”之类的物产,会被零星地记载在“草、木、蔬、果、鸟、兽、虫、鱼”等种属中,并在随后的描述信息中对其药用价值进行说明。总体来看,虽药用物产在具体的种属归依上互相混杂,并无定例,但是仍然以传统分类方法作为分类依据,只在传统分类框架中进行调适<sup>③</sup>。清末期至民国,方志药用物产分类体系伴随着时代变迁与西学知识的传入而产生更新,出现了传统和近代分类体系并存的情况。反映到方志药用物产的编纂当中,其分类体系开始出现西方分类体系的身影,在方志药用物产分类体系中呈现出传统与近代并存的形态。一方面部分志书纂修者除了仍旧参照自然属性分类法之外,还会参照传统本草的分类体系。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达县盘石乡志》在对药用物产进行分类时,将药用物产按照药用部位分类为:根部、叶部、梗部、花部、果部、子部、仁部、壳部、子部、草部、动物部、有根无苗部、无根无苗部。除此之外志书纂修者开始以“界、门、纲、目、科、属、种”近代分类体系作为药用物产的分类指导,对药用物产进行分类。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雷马峨屏调查记》中对药用物产的描述就引入了西方分类体系,如“贝母(*fritillaria Roy Lei*),百合科贝母属宿根草木。”<sup>④</sup>民国三十三年(1944)《新纂云南通志》中对于药用物产的分类开始归属至麻黄科、蓼科、忍冬科等。

其二,经验形态的知识开始向原理形态的知识转型。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把握往往是基于日常生活生产经验,通过自身感官所能触及的层级,逐步形成了“经验形态”的知识。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具有规律性、普遍性以及系统性特点的“原理形态的知识”传入中国,学者们开始以“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希望通过对生产生活经验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探索和把握,从中找寻到普遍性真理,逐渐套用西方学科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加上中国古籍的例证,

① 曾荣:《论近代自然科学与中国地方志的转型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5期。

② 民国《金堂县续志》卷1《疆域志》民国十年(1921)刻本。

③ 自《尔雅》训诂诸经开始,则初建了中国传统的“草木鸟兽虫鱼”的生物分类体系,《周礼》则是对物产进行初步分类,动物有毛、鳞、羽、介、裸之别,植物有皂、膏、核、荚、丛之异。由此逐步构成了中国传统的博物分类体系。参见余欣,周金泰:《博物学与 Natural History: 东西方知识传统的构造》,《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④ 民国《雷马峨屏调查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



并通过系统推理形成的演绎体系对知识进行表达,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sup>①</sup>。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构建使得志书纂修者开始有了新的眼光和知识,药用物产的书写出现西方科学的身影,内容和体例开始向科学化转型。以不同时期方志记载“牵牛子”为例:

嘉庆二十一年(1816)《华阳县志》:牵牛子,《本草》:“一名黑丑,一名草金铃,一名盆甌草,一名狗耳草。”陶弘景曰:“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故以名焉。”李时珍曰:“近人隐其名,黑者为黑丑,白者为白丑,盖以丑属牛也。金铃象子形,盆甌、狗耳象叶形。”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盆甌草,蔓如薯蓣,结实后断之,状如盆甌,气味苦寒。”<sup>②</sup>

同治五年(1866)《仁寿县志》:牵牛子,野生,甘寒。逐痰泄水、破坚决壅,功甚猛。<sup>③</sup>

光绪三十一年(1905)《定远县乡土志》:牵牛子,药用草本植物。特征:茎软不能特立,卷络支柱,附物缠绕,谓之缠绕。茎互生,长柄网脉。叶成,通常三裂形。叶腋抽轴,轴顶开合瓣花冠,成漏斗状。花瓣及萼俱五片,萼下有二苞,雄蕊,五雌蕊合生,自成三室以上之子房。其性善变,花苞无定,蓝、黄、绛、白皆可以人工夺之。花将开时,取此花雄粉着于彼花柱上,则此花之色变成彼花,结实为破面干果。果无淀粉,惟有结晶胚乳,滋养子叶。媒介:花有蜜线,分泌能诱虫类为媒介。时期:春季下种,秋季结实。效用:性甚寒,有毒。能利大、小便,除风毒。类例:甘薯茎亦柔软,成葡萄茎,近似旋花,与牵牛同属旋花科。<sup>④</sup>

上文显示,牵牛子在嘉庆、同治年间方志的记载中,往往仅记载别名、主治,对于其性状描写等缺乏科学说明。而在光绪年间方志记载中,不仅描述了牵牛子的生物学性状、传播媒介,还通过类比说明知识。由此可见,志书纂修者“以科学为准则,悉钩考而详列之。足见万物之生,皆有适于人类之用,庶览者如所取舍焉”<sup>⑤</sup>的科学精神。

其三,由“多识以明经义”到“宜物以利民生”的实用主义转型。“药,民之所用以济其夭死也。”<sup>⑥</sup>早期方志药用物产的书写仅仅是“参照新旧各志并见闻所及,凡民生日用所资,确为本县所产者,一一纪载,不嫌琐琐,以供留心物产者之参考。”<sup>⑦</sup>其目的主要是“释其名义,考其功用”<sup>⑧</sup>“以资见闻”。通过多识、博物可以“了解自然,‘通神明之德’,掌握自然规律”,但“人民困苦,欲伸补救,非振兴实业不为功”,因此志书纂修者开始重视实业,关心民生,希望能够对药用物产加以有效利用,开发药用物产资源服务日常生活。“以谋其社会之隆,地方之荣,而继长其民之福利。”<sup>⑨</sup>由此志书纂修者对于方志药用物产的书写内容开始由博物转向实用。如民国十年(1921)《南笼续志》在其序言当中便已声明:“旧志物产,业已详尽无遗。今谨择于实业有关,为现今必要之品,最重之物,足以畅销于外省者。”对药用物产的记载强调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如“樟,按樟产南境者甚佳。可以取脑,土人名为樟脑,又名爱粉。盖粗而浊者即潮片,细而净者即米片。乃现今西药品中必需之物,常出重价购之,特供不给求耳!”并一再强调:“所列各物最重要!幸邑境均能产出,物质既属优美,销路或已畅行。惟冀业此者加意改良,力图推广,产自天然者须知培养,出诸人力者益事讲求,则实业前途自有振兴之一日矣!”<sup>⑩</sup>药用物产的书写内容,除了指导民生实

① 翟锦程:《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中国社会科学》2022第11期。

② 嘉庆《华阳县志》卷42《物产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③ 同治《仁寿县志》卷2《食货志》,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④ 光绪《定远县乡土志》卷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抄本。

⑤ 民国《南充县志》卷11《土物志》,民国十八年(1929)刻本。

⑥ 万历《营山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明万历四年(1576)刻本。

⑦ 民国《德阳县志》卷5《建设志》,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暨石印本。

⑧ 光绪《新繁县乡土志》卷8《物产门上》,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铅印本。

⑨ 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卷11《食货志三》,民国二十九(1940)铅印本。

⑩ 民国《南笼续志》卷17《风土志》,民国十年(1921)抄本。

业之外,还会指出不同的销售市场存在的价格差异。如民国二十四年(1935)《雷马峨屏调查记》载:“天麻,因夷人不善烘烤例须由汉商自行就地制作。在夷地大约食盐一斤可易天麻四五斤,极为便宜。经制作后,运至汉地,则利市十倍矣。”<sup>①</sup>上述的文字记载,反映出了包括地方官员、士绅以及乡贤在内的志书纂修者渴望边地富庶,祈愿桑梓繁荣的满腔热忱。

概言之,方志药用物产的书写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依据书写者自身的视界而不断转移,既是经验到科学的互动交融,也是博物向实用的酝酿催生。基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方志药用物产的内容日益繁盛而全面,体例规范而严谨,逐步产生了由传统的博物学知识向近现代知识转型的文化现象。基于时代需要,志书纂修者“经世利民”的家国情怀不断融入药用物产的文本书写。或许会出现“物产关系民生,欧美各国生产方法,靡不精益求精。吾国墨守成法,不知改良……可慨也”的无奈,但更多的是志书纂修者在面对外侮频仍,国势慄慄自危的情况下,所迸发出的“事在人为,值此科学发达之二十世纪,荒凉沙漠尚可使成沃壤。目前政府正提倡改良农业,兴复农村,果能从事生产建设,以复过去之繁荣,亦非绝对不可能之事,是在邑人之善,自努力耳”<sup>②</sup>的决心和信心。

## 结 语

透过云贵川地区药用物产的历史书写,折射出志书纂修者的个人意识、国家视野下的文化整合与中西交流下革故鼎新的交织图景。其一,方志药用物产所记载的均是地方上的志书纂修者在传统农耕文明整体发展的框架内,对当地药用物产不断认识与利用的过程,一是志书纂修者会凸显云贵川地区的优质药用物产,以表达其自豪之情;二是纂修者通过民族医药知识叙事,可以看到不同民族药用物产进入汉文化书写这一进程;三是出于励官箴的现实需求,云贵川方志药用物产知识不断疏证、援引与重设,对于药用物产微妙而又深刻的药物知识的取舍与编排,其“言必循经,事必稽古”的著述之法,在编纂时会参考大量的典籍,将与记载对象相关的医药知识汇集于此,实际上是药用物产知识的持续强化和循环再生。其二,方志药用物产的历史书写也是透视国家、地方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方志药用物产无论是书写体例还是书写方式,都呈现出在“大一统”思想及儒家文化影响下知识由地方向中央趋同的动态变化过程。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本土医药文化知识最终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医药知识文化风貌中,方志药用物产文本成为了解地方药物知识历史资源的重要媒介,实证“在博物中遇见中国”。其三,西学东渐以及内忧外患背景下,志书纂修者们利用新的科学体系以及全新的认知阐释了“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事,商不出则乏用。是宜兼收并蓄,力为倡导,俾物产日丰,民生日裕,民俗民德,亦当因之并进矣。所系岂不重哉”<sup>③</sup>的实用主义情怀。

药用物产本身伴随着包括生态环境内化、点一线一面一体的商贸往来、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时空层序递进及勾连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表征出复杂演进。云贵川药用物产是适应性和系统性的,随时间与空间的改变,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是一种自然限定下的适应。并且云贵川药用物产的地方性知识与乡村的许多禁忌、习俗和信仰都有所关联,具体包括:节气节日、人生礼仪、传统技艺、信仰体系等。由此,才有了结构多样的药用物产知识体系,还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中药体系。药用物产的地方性知识又是通过历史叙述与国家、中心建立联系的,在整个国家框架中保存下来的。但是上述所及内容,仅通过地方志药物知识的记载以及历史书写难以阐明,为此后续将另行撰文予以探讨。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民国《雷马峨屏调查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本。

② 民国《德阳县志》卷5《建设志》,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暨石印本。

③ 民国《姚安县志》卷6《物产志》,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